

黃 昏 夢

44.572
C1547

666567



10031759

社科库清3



黄昏梦

张 武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黄 昏 梦

张 武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 昌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10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898

定价：1.75元

眷 恋

马玉清眼见得老了，走动手里拄着棍子，完全是上了年纪的作派。村里的年轻人不再象过去那样，称呼他“马支书”、“老书记”，而是根据各人的年龄、辈份，分别叫他“马爷爷”、“大爹”、“大叔”。没有精确地统计过，似乎叫马爷爷的占多数。

这本来是很正常、合情合理的事情。可马玉清感到别扭，不舒服。答应不是，不答应也不是。他没有象别的老汉那样，爽爽快快地应个“哎——”，而是用“哦，哦”这种含混不清的语气敷衍塞责，样子挺可笑。

平心而论，他不是那种喜欢人家叫他官衔的人。这个道理他懂。党员得有党员的规矩，凡事要遵循党的原则。

刚当上支书那阵，他曾不止一次地在群众会上声明，请大家不要叫他“马支书”，喊老马或马玉清。有人叫了马支书，他也要认真地纠正。可是农村有农村的特点，群众有群众的习惯。往常上面来个什么工作人员，尽管是个一般干部，甚至是以工代干的通信员，他们也得封他个“组长”，在大庭广众之中呼唤起来，显得敬重，也好出

口。何况马玉清还是县委组织部任命的支部书记！因此，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地喊他“支书”。后来时间一长，也慢慢地习惯下来，不管谁叫，他都答应得顺溜。连他的亲家哈存福也成天“支书”“支书”地喊叫。他再也没心思，也没工夫去纠正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才几天（他自己这么感觉，也这么说。实际上他在支书的位子上已经十六个年头），大家又改了口，好象有人下了命令似的，一个学一个，恭恭敬敬地尊称他“老爷爷”了。虽然是农村几千年遗留下的传统风气，文明礼节，可放在他身上，听起来不免有点“酸溜溜”，不大自在。他过去有个爱板面孔的坏习惯，特别是碰到不顺心的事，他总是皱着眉头，连半句多余的话也没有，把情绪全部表露在脸上，一点也不“含蓄”，反倒给人家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，颇有几分官老爷派头。不过，什么事情，见得多了，就习以为常。同样，对他的板面孔，大家看惯了，也就见怪不怪，以为是支部书记应有的派头，不这样做，就镇不住人，反倒不成其为书记了。

最近一个时间，他也不大顺心。

半年前支书改选，他响应中央关于支部“四化”的战略号召，主动让贤，口头申请，退了下来，连支部委员也不保留。当时他确确实实从党的事业出发，无丝毫杂念，他真正做到了心情舒畅，思想愉快。原以为辛苦了多年，一朝放下重担，从此少牵无挂，可以安享晚年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走走坐坐，老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究竟失掉

了什么，支书的位子，还是工作的机会？手中的权力，还是当干部搞特殊化的利益？啊，啊，多么可怕，他实在说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情绪。从前他认识一个倒了嗓子、提前退休的秦腔演员，回家以后死也不再进剧院，好象有什么隐痛似的。他问为什么，演员说，看到别人在台上演戏，由不得自己地手痒、脚痒、嗓子痒，心里难受，不如不看。马玉清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情？说不明白。或许是两码事，不能相提并论，胡乱打比方。

过去有工作的日子，老是觉得时间过得快，太阳落得早。春夏秋冬，就象数一二三四那样，一晃就过去了。现在的日子就显得格外地长。这是上了年纪的人不应该有的心境。以前他只有上县里开会才有过这种感觉。“唉，现在有个什么会叫我去参加多好！再长再拖拉的会我也坐得住……”有时候脑子里也出现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念头。

家里房子多，人少，老伴又成天不落屋。一个人坐着冷清，曾设想要个外孙子来养着解闷儿。可是说来说去，竟没有一个痛痛快地答应把孩子送来，倒好像不是替他们减轻负担，而是沾他们什么光似的。也正好证实了“儿要自养，谷要自种”这句俗话的真理所在。罢了罢，索性谁的娃娃也不要。家里冷清，出去串串门子，找老哥儿们唠唠，也一样地打发日子。可是过去忙忙迫迫地惯了，现在又一下适应不了坐下闲拉呱的环境。无论坐在哪里，总也不安生，心里空落落、急慌慌地难受，好象缺了点什么，有什么事没办妥贴；和人家谈话，也是一副心不在焉

的样子，有一句没一句的，说不上三句话，就没词儿了，常常出现冷场现象，弄得对方也别别扭扭，没心思张口了。老亲家说他是天生的苦命，不会享福。

他把这种感觉诉说给老伴赵凤英，她不但不说一句安慰的话，反而撇着嘴讥笑。毫无同情心。

她也是一年前从大队妇女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的。可人家在思想感情上没有这样别扭，看不出有什么空虚感来。她也失掉了“赵主任”的称呼，青年人喊她“大妈”，小娃娃叫她“奶奶”，她全答应，心满意足，好象在自己家里没人喊叫，她专门出来享受那些亲切甜蜜的呼唤似的。谁也没有分派，她毛遂自荐，当了计划生育的义务宣传员，忙得脚不沾地，比当主任时还忙。他羡慕老伴，甚至在羡慕之中带着几分嫉妒，难免有些讽刺性的玩笑。她才不在乎呢。她说他享受不到欢乐的情绪，是他多年当支书养成的脱离群众的坏习惯。他当然也不服气。可是晚上睡下想一想，觉得老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现在虽说不当书记了，可原先当支书的架子还在，和老弟兄们谈话，说不定还带着某种官腔。自己觉不出来，别人听着不舒展，难免人家讨厌。

就说前天吧，他去红柳滩上转悠，碰上他的亲家和打鱼的陈福来，还有放牲口的丁生贵，三个人围在一堆打扑克牌。输了的人，从自行车的三角架里钻一个过，学狗爬。真是无忧无虑，返老还童。政策一放宽，农民日子好过了，心境也不一样。看把他们美的！我也伙上乐一乐吧！他

这么想着，就凑了上去。可他刚一坐下，空气就不一样了，怪得很。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话，只是用商量的口气，问了问大家对开发利用红柳滩的意见，好象还说了不要光顾眼前，要想办法扩大再生产的话。几个老头对他的意见反应相当冷淡。尤其是他的亲家，那个牲口贩子，竟象耗子见了猫那样，借口要去追跑散了的牲口，抬起屁股溜了，仿佛还是八年前批资本主义思想的那时候。真是没情形的老东西！难道我马玉清是吃人的老虎？

哦，想起来了。那天他和哈存福扯磨，人家以亲家的身份，关心他，劝他不要再操心工作上的事，活几天心闲人，该享受的享受。他却半开玩笑，用《古兰经》上真主启示的一句训示回绝了：

“今世的享受比起后世的幸福来是微不足道的。”

作为共产党员的马玉清，自然也不可能想到后世的事情，其意不过是人活着的时候应该多干点工作。但哈存福却以为是下台的支书在批评他。因为这个牲口贩子虽然天天礼拜，心里却时时刻刻地盘算着赚钱发财、个人眼前的生活享受。

很有意思的扑克场子散伙了，他觉得有些扫兴。丁生贵背起手，拉着他的奶羊，迈着慢悠悠的步子，朝南面放牧去了。羊脖子上的小铃铛，不断发出叮呤叮呤的响声，清脆悦耳。陈福来骑着自行车去黄河沿上看他的“拦河钩”。这老东西近二年光打鱼卖的钱怕有好几千了吧！人也大方了，见人就散过滤嘴的烟……

三个老头各自东西，奔自己的生财之道去了，丢下马玉清一个人孤孤单单，好不难过！一个人拉着沙枣木棍子，吃力地在红柳滩上走着。人常说，无官一身轻。他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这个轻松味道来。

前几天他听说本公社一个和他同期当过支书的人，下台以后由他牵头，自由结合搞了个建工队，在城里承包基建工程，一年挣了好几万。他的女婿曾在那个建工队干过几天，回来到处宣传，意思是他也能这么搞。马玉清听了毫不动心。要说搞这类玩艺，他马玉清不比哪一个差。组织能力有组织能力，手艺有手艺，木活泥活都能来两下子，赚个万二八千的，毫不费难。可他的兴趣不在那上头。两个女儿都出嫁了，又没儿子，老两口守着一大院房子，有存款存粮，吃穿不愁。钱财东西，什么时候是个够？他不想这些事。人各有志，他的心病害在红柳滩上。

红柳滩两头小中间大，在公社的地图上是个菜瓜形，是他们大队的势力范围。群众中编了顺口溜：“红柳滩，两头尖，东靠黄河西靠山，只见荒草不见田……”意思是地势低洼，水排不出去，只长芨芨、芦苇、三棱草、红柳，没法种庄稼。夏秋季节从城市里跑来撒网钓鱼的工人干部倒不少。丁生贵、哈存福这些人放牲口极便当。可是这么一块紧靠黄河的平地，眼睁睁地让它荒着，确实于心不忍。马玉清当文书的时候，就有过利用这片荒地的打算，只因种种原因，未能如愿。如今下了台，他总觉得心里欠了什么债似的——不光欠人的债，而且欠了土地的

债，睡不安生，吃不香甜。前几天他个别串联，问了好多人，听说开发红柳滩，愿包土地的包土地，愿包水面的包水面，十年以内不纳粮，都乐意干。有的还愿意拿出钱来投资。这么一来，他的心劲就大了，似乎红柳滩马上变成了“刮金板”，明晃晃地耀眼。

从滩上回来，趁着时间，他又拐到大队长丁仲魁家，想问问大队对这个事讨论的情况。可是大队长不在，只有他的父亲在。老头是主寺的阿訇，刚刚去寺上领了拜回来，身上的袍式大礼服还没来得及脱，见马玉清来，极有礼貌又有风度地招呼：

“老支书，快请坐！”

听到老阿訇这样称呼他，马玉清心里热烘烘的。他并不是非要别人这样叫他，不过这样的称呼，说明有些群众是记着他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，担当过的职责。

“总也不见你老人家上寺，好着呢吗？”

“好，好……就是这腿脚……”

说着，他把右腿稍稍收拢，尽量让其舒服些。把手里的棍子立在靠炕头的蹲箱上，双手慢慢地揉膝盖。

他的腿是那年带领民工上渠修水利，在潮湿的水渠上打地铺得下的寒症。当时也没有发觉，过了半年，才觉得不对劲，到医院里去检查，说是“风湿”，针也扎了，药也吃了，都不管用，腿越来越僵，越来越疼，以至于连自行车的大梁也跨不上去，只得慢慢地步行。他亲家说，论他这个资历，要是吃了公家的饭，肯定以工伤对待，医药

费全包，还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。他总是笑着解释：“咱农村还不发达，没这个条件。再说，我又不是没钱看病！”前几天大女儿从城里给他买了一根烫了花纹的龙头拐杖，就是老百姓说的“文明棍”。难为她这番孝心。可是试用一下，尺寸不够，样子也扎眼。原本不是老农民用的东西嘛！送给老伴？看她那精神，二十年以内用不着。只好挂起来，自己想办法，就地取材，从院外的沙枣树上选了一根比较直溜的枝条，砍下来当了拐棍。就这，也怪别扭的，不相识的人见了，还以为他是提着打狗棍的叫花子呢，真是……

“给你马爷爷泡茶！”

丁阿訇大声向下面的屋子里吩咐一声，又关切地劝慰老支书：

“好我的老哥呢，你不会省点精神做做礼拜吗……”

马玉清只是笑。

“过去压着担子，没法休息。现如今有他们一帮年轻人在前头跑着，你何必这样奔忙？腿又不便当……你看我除了寺上的事，回家百事不管，只图有碗软和的热饭……”

“我和你不一样……”

送上茶来了。他只好接住盖碗，把下面的话咽住，心里想：我是共产党员，能和你一样么？

“喝茶！”

丁阿訇恭敬地让着，自己也端起了讲究的蓝花描金盖

碗，刮了刮浮在上面的叶子，喝一口，放下，问：

“你还记得何县长吗？”

“咋不记得，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。”

提起当年的事，马玉清总有一种特别甜美的回忆涌上心头，脸上也放出光彩来。

“老县长退了！”

“我听说了。他比我大六岁……”

“公家给盖了一院房子，七间，独院。栽的果树花木比你家院里的还多。”

“应该的。”

“你要是吃了公家的饭，也会这样……”

“我现在也不错。”

“何县长现在百事不管……”

“不会的。人家是顾问，还操着心哩！”

“那还不是装样子……”

听到丁阿訇这个话，老马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清楚地感觉到，目前社会上流行着的对老干部的偏见，已经传染到农村来了。在有些人的眼里，老干部退下来就意味着纯粹地享受，和革命工作绝缘，百事不管……

大队长不在，和这位敬奉真主、谨守拜功的阿訇是讨论不了什么问题的。他关心的是清真寺，赞颂真主、做礼拜，讲“瓦尔孜”。他是共产党员，前任支书，心里想的是工作，开发红柳滩……两个信仰，两种心思，正如《古兰经》上说的：我有我的工作，你们有你们的工作，你们所

做的事与我无干，我与你们所做的事无涉。

一碗茶没喝完，他就起身告辞。

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，腿僵得厉害，几乎站立不起来。老阿訇一面扶他，一面同情地说：“你也找个好医生看看嘛！”

“只怕吃人参也没希望了！”马玉清苦笑着说，“幸亏我不上寺，要是上寺礼拜，跪都跪不下去……”

“愿真主保佑你！”

丁阿訇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，临分手，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：

“你找仲魁有事吧？”

“我想和他商量红柳滩的事……”

“他们在大队开会。”

“哦，我去找他们。”

“听仲魁说，搞水利上面不投资？”

“不是不投，咱们最好不要……”

“对，对……”

“国家还不富裕，可这二年，咱们社员手头有了钱，自家想办法……”

“这也是个办法。你们研究，到时候我也捐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向安拉起誓！”

“哎呀呀，好我的老阿訇呢！我差点冤枉了你。我以为你不赞成这个事呢，嗨，你看我这个人，越老越不中

用……”

“看你说的，好事谁不支持？不过你们对众人说明白，这捐钱的事……”

“自觉自愿。不是捐，是借。将来有了收益，如数归还。”

“这就好，要向大家说清楚。这几天上寺做礼拜的人都议论这个事……”

“借你的金口，给大家解释吧！”
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

……

怪不得在滩上碰到三个老头是那般情景，原来病害在这里……哎，只怪我没把话说清楚。糊涂，糊涂……改日见了他们，得解释解释。

因为丁阿匐的积极赞助，大大鼓舞了老支书的情绪，只觉得身子也轻了，腿上也来劲儿了，几步就来到大队办公的地方。过去在任上的时候，他的铺盖就在大队办公室，一年里少说也有三百天住大队。自从下台以后，他来的就有数了。他原打算，趁着开会，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家说说，顺便议一议，没想到他刚一伸头，新任支书高占录就跑到门口，委婉地把他挡住了：

“大爷……”

就这个称呼，也够他缓半天的。

“我们正在开会，请你老先在合作医疗站的房子里坐一坐。完了，咱们再说……”

嘿，好小子，你也给我打官腔了！什么要紧会，谁还没参加过…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，你如今是“大爷”，不是支委，有什么资格参加人家的支委会呢？不过新任支书的态度实在过分了！我又不是要你们给我个人解决什么困难，我是为工作上的事，你们就这样……下台干部的滋味真不好受啊！

他怀着委屈的心情，在医疗站的房子里和看病的社员、医疗站的医生东拉西扯，足足闹了一个小时，还不见大队领导人的会议散场。他真的生气了，拄着棍子回家，可是没走上几步路，支书和大队长双双骑自行车撵来了：

“大爷，大爷，等一等。”

“马爷，马爷，你咋走了呢？”

听听，大队干部也是这个口气。就冲这个称呼，他也没有好脸色：“我怕打扰你们的会！”

“完了，完了。来，坐到车子上，咱们到大队去说……”

“坐我的车子吧！”

“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我也没什么大事情，只不过想问问红柳滩的事……”

“哦，你是操心这个事！”新支书说，“好倒是好事，不大好办。我们准备向公社写个报告，请示这样搞，合不合政策……”

“还有投资的问题。”大队长插了一句。

“投资的问题，咱们自家想办法吧，我问了好多人，愿意借出钱来。连你们老爹也情愿拿钱……”马玉清笑着向大队干部汇报情况。

“这里面也有个政策问题。”

“自己拿钱办自己的事，有啥不合政策的地方？”马玉清很有些不高兴。

“好我的马爷哩，你出这个点子，不是叫我们搞平调吗？现在的政策是尽量让农民少负担一些，多收入一些。你叫大家拿钱，捐也罢，借也罢，总是从社员手里要嘛。弄不好，上头又批评我们刮共产风，搞‘左’的那一套……”

“左的？”马玉清重复着，玩味新支书的话，心里很敏感地想到了过去的事情。

六十年代初，有过一次整风整社运动，马玉清当过一次典型。因为在吃食堂的时候，他把社员家的锅、碗、瓢、勺收了个一干二净。可不知怎么搞的，高占录的奶奶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，却瞒过干部的眼睛，私藏了一个小铁锅，趁着别人下地干活，烙馍馍给她的小孙子吃。有一天被马玉清发现了，没等馍馍烙熟就把锅提走了。老太太哭了一阵，骂了一气，最后在铁锹上烙熟了那张夹生饼。后来纠正“共产风”，把他结结实实地批了一顿。可那时高占录不过是小娃娃，并不完全清楚当时我们国家社会变革当中发生的大事，只是听别人说，算不得亲身经历。他今天说这样的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真的提醒人们

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，还是认为他这个下台支书脑子里只有左的那一套，没资格提新建议呢？十有八九是后面一层意思。

想到这里，他心有点凉，脸也凉了下去（当然不同于过去的板面孔），说了一句“那好，你们研究吧。”就转过了身。

两位大队领导人争着要用自行车送他回家，他谢绝了，心想，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哩，你们还是多关心关心工作吧！

他有气无力地回到家里，好几次下决心，不再操心工作上的事情，不再给干部出点子，惹人讨厌了，可又弄不掉那块心病，红柳滩老是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，争着闭着都一样。夜里睡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合不上眼，心里难受，长嘘短叹，比那年受整挨批判还难受。

他的亲密战友赵凤英可不这样。她的脸上没有黑灰和忧色，就象永居乐园中的居民，乐不知老。白天脚不沾地，晚上头一放到枕头上，就打起很响的呼噜；一觉醒来，发现老头子还睁着眼睛，问：

“你又想什么，深更半夜地不睡！”

给她说啥呢，想工作？工作没有眉目。他用更长更重的叹气声做了回答。

“你这个人哪，越老越不中用！”老伴不客气地批评道，“工作上的事，哪有容易的？一次不成两次，两次不成三次，总有成功的时候吧！”